

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建国”： 吴玉章教育思想研究

陈露茜 吴秋翔

[摘要] 吴玉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经历了从“教育救国”的工读主义到“教育建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历史性转折，明确了“为国办学”“为民兴校”的根本主张，强调教育的社会性、生产性与阶级性，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与培养新时期新青年的战略设计。吴玉章教育思想生动诠释了教育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价值导向；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教育目的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实践与改革论。

[关键词] 吴玉章；教育思想；教育救国；教育建国

吴玉章（1878—1966）既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又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和实践者。他从青年时期参与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倡导“教育救国”运动开始，到延安时期创办干部学校、推进群众扫盲、任职华北大学，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创办新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说，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改革与实践是吴玉章一生的追求与贡献。

近年来，《吴玉章文集》《吴玉章教育文集》《吴玉章论教育》以及《吴玉章全集》的出版，为研究吴玉章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观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参考，也使得我们从整体上考察吴玉章教育观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成为可能。为此，本研究尝试在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吴玉章在不同时期如何直面中国社会与人民大众的现实教育需求，为国办学、为民兴校，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形式与内容，逐步发展并完善其教育思想。

在20世纪早期中国教育近代化漫漫求索的过程中，吴玉章早年的教育实践活动曾经遭遇挫折与徘徊，其教育观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经历了从“教育救国”的工读主义，到“教育建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历史性转折。为此，本研究也将聚焦于这两个基本阶段，对吴玉章教育思想进行历时性考察，以呈现其教育理念的核心逻辑。

一、“教育救国”：20世纪20年代之前吴玉章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

吴玉章出生于1878年，成长于洋务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求强”“求富”“讲究实用”是时代的主旋律。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走上了学习西学、抵御外侮、改革社会、富国强兵的

作者：陈露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luxichen@bnu.edu.cn；吴秋翔（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wuqiuxiang@ruc.edu.cn。

*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建议与帮助，文责自负。

“救亡图存”道路，迈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一步。“经世致用”“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文化教育领域近代化的重要理念。在“戊戌变法”之后，废科举、兴学堂、开民智，渐成时代洪流，涌现出国民教育思潮、实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教育改革浪潮，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了中国近代新青年们的美好理想和迫切愿望，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吴玉章。

吴玉章曾先后求学于张之洞所创办的尊经书院、凤翔书院，接触了诸多西方思想，开阔了眼界；后又赴日本留学，接触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不断强化了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信念。学成归国后，吴玉章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与同样热心教育事业的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将“教育救国”的观念与行动推向高潮，史称“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即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我国部分有志青年以勤工俭学、工学结合的方式求西学、求新学，进而实现社会改良的教育主张与实践。吴玉章因领导并参与了留法俭学会与华法教育会，成为这一时期工读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教育救国”的社会理想，并围绕着积极实现教育的社会生产职能展开教育设计：一方面，教育要面向全社会培养有现代知识的公民；另一方面，教育要促进民族交流，维护民族尊严。最终，教育要完成社会改造之理想。具体而言：

第一，教育普及、推进国民教育是教育救国的首要任务。吴玉章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政象之机陧，民生之凋敝……是皆因无术以善其后也”，“欲求利国福民之术，非学莫由”^①。推行国民教育，可以求新学、醒国民，可以雪耻外侮、改良社会，进而造就新社会、新国民。他曾在留法俭学会讲演会的演说中提及，他之所以积极兴办华法教育会，首意在于“扩张国民教育”^②，要“为国人作求学之津梁也”^③。他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局面归因为科学与技术的落后、观念的封闭，归因为教育的缺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大众的蒙昧。他认为，只有普及教育，促进国民觉醒，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人民大众、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复兴，才能真正有尊严地与世界各民族国家平等对话与交往。

第二，输入世界文明、阐扬儒先哲理是教育救国的重要抓手。教育救国、抵御外侮，既不意味着盲从西方观念，也不意味着夜郎自大般地闭关锁国。吴玉章认为，“自二十世纪科学发达，交通便利，全世界打成一片，成了整个的国际的组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就不能不受此时代的影响，而闭关可以自守的……中国……绝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中的一部分”^④。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引入西学、新学，“以世界人文进化之趋势昭示国人，俾对于世事洞若观火，无隔阂之患”^⑤。另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主动选择，促进世界文化对话融合。吴玉章指出，“一作先觉的人不可有专制性；二作青年的人不可有奴隶性”^⑥。

第三，发达国民经济、改良社会是教育救国的最终目标。吴玉章曾多次谈及，“改良社会，首重教育”^⑦；教育是民生，办学即为民生计。他谈及所谓“发达国民经济”，即“我国今日穷困极矣……与各国为经济之竞争，庶几可救贫困于万一……因势利导，不但国民之生计得以一舒，且可培植一般实业人才……以图国民经济势力之发展”^⑧。只有经济昌达，才能养成健全的国民；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民族、民权也才有了凭借。吴玉章曾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提及，“马克思曾说过，这个法则如鸡与卵然，到了成熟时就得要破壳而出的……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这个道理，等到客观的条件已具备，我们人力的推动就不得不使之前进，以促其成”^⑨。

可以看出，吴玉章早期教育理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现状息息相关，教育与国家命运

①⑤⑧⑨ 《吴玉章教育文集》，20、23、21—22、4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

②③⑥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1卷，13、14、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④ 《吴玉章论教育》，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⑦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册）》，168页，北京出版社，1979。

之间的深刻联系在其思想中已基本确立。他的教育主张并非限于教育内部进行讨论，而是更多地指向了教育的外部要素，涉及教育与经济、教育与国家、教育与民族的关系等问题，要求“以西方先进之科学，图中国教育之发展”，进而谋求社会进步。这一时期吴玉章的教育理念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而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国内恶劣的政治环境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工读主义教育理念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并引发了它的分裂：其中，有部分青年学生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国内组织工读互助组织，怀抱乌托邦式空想，走向无政府主义，这是对工读主义教育的片面理解与扭曲。^①而吴玉章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则受到了世界工人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探索新社会、新教育，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等。他们将尚俭乐学作为理想社会的雏形，为国家求知、求强，最终领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遗憾的是，受20世纪2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影响，吴玉章所领导的工读主义教育浪潮也渐渐偃旗息鼓。“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被迫流亡法国。在法国，吴玉章专攻政治经济学，并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时的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仅仅依靠美好的教育理想和新青年们的一腔热情是行不通的，要承认阶级斗争和经济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形成系统的革命纲领、革命组织和革命策略，三者联动配合才有可能成功。这便成了吴玉章教育观念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建国”、从工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契机。

二、“教育建国”：20世纪20年代之后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在五四运动之后，吴玉章返回四川。在回乡的过程中，他重读了日文版的《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称呼），并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批评反思。他认为，一是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二是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三是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四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对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②随后，吴玉章来到北京，系统阅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五一运动史》以及瞿秋白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等作品。这使得吴玉章意识到教育除了社会性之外，还有阶级性、生产性等诸多要素，注重工农阶级、注重系统理论的宣讲并借此改造国家机器至关重要。

1921年底，吴玉章回到四川讲学，此时的他已经开始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号召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到工农民众中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1925年，吴玉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后，他远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自20世纪40年代起，吴玉章便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办学活动。在这一时期，吴玉章先后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与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创办延安大学并任校长。1943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会议讨论，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由吴玉章出任校长。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吴玉章随华北大学进入北平。此后一个时期，吴玉章先后发表了《把智慧贡献给人民》《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五十年来英勇奋斗的中国青年》等一系列演讲与论文。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大学的决定》，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至此，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吴玉章主持合并了政法大学以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部分骨干，开始了他在新时期的办学活动。吴玉章在主持中国大学工作的17年间，将中国大学建设成一所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

^① 参见吴洪成：《中国近代教育思潮新论》，218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② 参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吴玉章研究会：《吴玉章传（上卷）》，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律、历史、新闻、档案等多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培养全日制毕业生6万余人，函授教育本专科生近2万人，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政治人才与专业精英。由此，也形成了吴玉章“教育建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即教育为何建国、教育如何建国、教育建国如何实现等关键问题。

（一）“教育建国”既是中国国情的现实需求，又是处处为“大众着想”的必然出路

如果说吴玉章早期“教育救国”思想仍停留在美好教育理想层面的话，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吴玉章的教育观体现出更强的社会性、阶级性与生产性。他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毫无疑问地受到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制约，需要依靠工农阶级，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民大众，为中国革命与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培养人才。这成为吴玉章“教育建国”的目的论。

第一，教育应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团结群众的重要文化战略。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革命和发展问题时，深刻认识到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的发展依靠教育。^①从延安时期开始，吴玉章就积极推进新文字运动。他认为，在革命时期急需群众的觉醒，“把党的政策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以团结人民”，这不仅仅是一项文化政策，更“有着第一等的意义”。^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总人口中有80%是文盲。吴玉章为此忧心忡忡，他认为这将极大程度拖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成为建设新中国、巩固新政权和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权利的重大障碍。1949年8月，他致信毛泽东，要求将新文字和扫盲活动列入国家战略发展议程，总结延安时期的文字改革活动经验，在全国推广拼音文字和简化字。吴玉章认为，我们“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设不起来的。我们必须尽量深入到乡僻区域去扫除文盲，使我们正在生长起来的一代人没有不识字的”^③。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扫除文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文字改革、扫除文盲、“学校向工农开门”便成为党建设国家的重要文化战略组成部分，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教育基础。

第二，教育与学术是国家事务，教育与学术应为生产建设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从大规模的革命战争转移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上来，党对教育工作在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从重视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转移到教育的全部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上。^④吴玉章认为，如果在旧中国，教育与学术是私人事业或者慈善援助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教育与学术应明确成为国家事务。为了实现这一教育方针，既要求教育科学工作“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责任”，发展“各种科学成果，利用它们来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又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科学地制定一个“全面性的、适合人民需要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形成“计划性的科学”^⑤，而这一科学与国家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负责地解决政府与生产部门所提出的问题。把教育与学术作为国家事务，高度肯定了教育工作在推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反映出教育应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本功能定位。

第三，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是以机器大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作为前提条件。^⑥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下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吴玉章指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有社会

^{①④⑥} 参见《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160—161页、115、14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②③}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2卷，217、2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 《吴玉章论教育》，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②的必然要求。在吴玉章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事业必须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改长期以来教育与劳动脱节的根源性问题。学校教育光靠理论教育、靠课程和教员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让广大青年在课外参加劳动，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车间工厂，在实际的学习与生产劳动中贴近工农，接受与劳动人民接近的教育。从早期“教育救国”中的勤工俭学，到后来“教育建国”中的相关论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说是吴玉章教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需要，表明教育的阶级性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广大青年从一点一滴的日常生产劳动中获得体会，进而形成共识，完成思想统一。

（二）“教育建国”既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需要掌握先进文化科学知识

吴玉章认为，理论武装与扎实学识指明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③，这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它指明了吴玉章“教育建国”的本体论，既要求必须重视政治学习，又要重视业务学习；既要注重理论武装，又要扎实学识；既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需要掌握先进文化科学知识。

一方面，理论武装是先导、是方向，指明了教育的性质和政治立场。在新时期培养新青年，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在政治方面，对学生的要求首先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愿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④。正如吴玉章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所提及的那样，要让新青年成为新文化的先锋队，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学艺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完成新时代赋予现代青年的历史使命。^⑤ 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吴玉章更是明确指出，新中国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生的思想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专家”^⑥。吴玉章认为，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武装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团结群众、引领青年、完成思想统一的重要理想信念。新中国的新青年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观念，只有统一观念，才能统一行动，才能自觉而不是被动地行事。因此，吴玉章始终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把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归根结底回答了教育培养什么人的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扎实学识是根本与基础。要让广大新青年自觉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学习业务，要培养现代青年掌握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吴玉章认为，“青年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力求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的素养，深入到具体的业务当中去，做到有真才实学，拿得出本领，成为工作中的高明的人”^⑦。吴玉章坚持青年人学习业务应与国家需要相结合，在精进业务本领、成为“内行”专家的过程中，要摒除获取个人名利为目的或是为了个人发展而盲目追赶浪头的态度。不要狭隘地理解“业务”的意义，要知道在革命工作中“行行出状元”的道理。^⑧ 各行各业都有着丰富的业务内容和创造性工作，都可以学习掌握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吴玉章看来，青年人要成为党和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需要在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志愿的同时，又能结合国家实际需求，精通某一门业务知识与技术，锤炼真才实学，真正做到对人民有益、对国家建设有用。

在吴玉章“教育建国”思想的本体论中，理论武装是“首先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是必须的；但理论武装又不是“空洞的”，它必须通过“具体的业务学习表现出来”，“每一种

^① 吴玉章：《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1958年9月14日在新学年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载《教学与研究》，1985（6）。

^②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2卷，4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③④} 参见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5卷，2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⑧} 参见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31、310—3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⑥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419页，重庆出版社，1987。

^⑦ 《吴玉章论教育》，1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专业知识中都包含着政治成分”，而每一项政治观念的塑造又离不开专业知识的依托。实际上，这一理念也反映了毛泽东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红”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与根本立场；而“专”是一个人的业务能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① 吴玉章深刻辨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理论武装同先进文化科学知识为扎实学识之间的主次关系，使两者成为吴玉章教育本体论“一个硬币的两面”，即“依新民主主义社会之需要，进行各种教育，使学员获得并掌握专门业务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政治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以培养学员具有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作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勤务员”。^②

(三)“教育建国”既需要注重普及教育，又需要重点培养新时期的新青年，其中高等教育、干部教育是抓手

在完成了“教育建国”的目的论与本体论的观念体系后，吴玉章又在其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完成了“教育建国”的战略举措设计，即一方面面向人民大众，注重教育普及；另一方面面向新时期新青年的培养，以高等教育与干部教育为抓手。

第一，要想真正变革社会，塑造有知识的工农大众是重中之重。吴玉章认为，“大众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大众的进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的聪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坏。教育好的国家，那么人人都有力量而国家也有力量”^③。因此，要想实现革命的胜利，注重大众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识字能力、文雅水平与民族革命意识是关键。同时，新中国的发展有赖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使其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而人们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又与教育权和发展现代教育这两个重要教育因素密切相关。^④ 在吴玉章看来，“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最大弱点之一，就是教育不发达，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大半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半都是文盲”^⑤，而新中国力求解决这些问题，要还教育于人民，使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变成为多数人服务的教育。因此，满足广大工农阶层的受教育意愿、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利，既应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文教政策，又具有维护革命胜利果实、保障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政治意义。

第二，要想真正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就要重点培养新时期的新青年，注重高等教育与干部教育。吴玉章认为，新中国的建设工作需要依靠“精通先进科学与技术，为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列主义知识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与各种具体业务相结合，并决心保卫人民民主主义祖国，忠诚于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将来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干部”^⑥。为此，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吴玉章积极设立各类本科、专修科、研究生处与文化补习班。首先，为长期培养各类新中国建设干部设本科。其次，为短时期内培养当前迫切需要的各种建设干部设专修科。再次，为招收工农干部、产业工人特设了文化补习班，在补习1—2年后进入本科学习。最后，积极培养教师，吸收一批已经具备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组成研究班。^⑦ 吴玉章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培养建设新中国干部的新式大学，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让他们掌握各种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使生产经验与科学相结合；从而使他们能够真正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上的重大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并广泛传播科学与技术知识。^⑧ 注重高等教育、重视干部培训，意在培养新中国的政治先锋、文化先锋、知识先锋，充分发挥新时期新青年的求知热情，大力培养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

^{①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131—132、1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②③} 《吴玉章教育文集》，72、5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

^⑤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2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⑥⑦⑧} 参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418、419—420、418—419页，重庆出版社，1987。

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吴玉章在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自觉地将其转换为教育实践：明确了办“人民教育”的根本主张，认识到教育与国家政治的密切联系、教育与经济生产建设的密切联系，不断强调教育的社会性、阶级性与生产性，进而凝练了“教育建国”的价值理念——为国办学、为民兴校，注重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掌握先进文化科学知识的辩证关系，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的“万千建国干部”。

三、吴玉章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综上所述，在考察吴玉章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注重教育的社会性、生产性与人民性是吴玉章坚持一生的教育追求。伴随着近代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斗争，吴玉章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促成其教育观中强烈的阶级意识以及要求根据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生长点。其中，从留学工读以求革命到办学兴校以谋国家兴盛的实践性转变，让吴玉章深刻理解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新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发展实践中的重要性。这是吴玉章教育思想从“教育救国”转变到“教育建国”的根本所在。而依靠工农阶级、最大限度团结人民大众，以及通过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经验来统一思想，是其教育思想发展转变的关键环节。

从教育目的论来看，吴玉章教育思想实现了从发达国民经济、改良社会，到依靠工农办“人民教育”、为中国革命和生产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转变；从教育本体论来看，吴玉章教育思想实现了从输入世界文明、阐扬儒先哲理，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掌握先进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转变；从教育实践论来看，吴玉章教育思想实现了从教育普及、推进国民教育，到既要注重普及教育、又要重点培养新时期新青年的重要转变。

在吴玉章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历时性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教育主张中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价值导向；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教育目的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实践与改革论。把吴玉章教育思想与其他同时代实业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等思想流派真正区别开来的，是其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教育事业的深刻认识，是对教育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是对植根中国国情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在吴玉章看来，教育并非脱离外部宏观框架建构的独立事物，也不是纯粹的教育方法论及教育教学的学问。教育的学术与政治是一体两面，教育本身要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现代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科学素质，推动国家和民族强盛。教育更要在大众普及的基础上，握紧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这两大抓手，要求青年始终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正确的政治引领下紧密围绕国家生产建设，不断扎实学识、精进业务本领，成长为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力军。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价值导向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吴玉章教育思想为当代提供的核心价值导向。早期“教育救国”的工读主义教育实践的挫折，使吴玉章深刻理解革命组织、革命策略与纲领在领导整体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也让其教育思想从美好理想落地生根，真正成为“有血有肉”、有实践意义的教育理论。他认为，在革命的年代，夺取革命的胜利与先进思想观念的引领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方面有赖于前线的浴血奋战，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教政策。^①

而在建设的年代，教育与国家、学术与政治更是密不可分。他指出：“提倡读书当然不是读死

^① 参见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28—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书，而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进行读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合乎国家需要的人才。”^① 吴玉章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谈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论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1950年《人民大学》校刊发刊词中，吴玉章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教育工作的基础，要让广大的新青年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要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任务”^②。同时，鼓励新青年们关注时事政策，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争取各种机会与劳动人民建立密切联系，以加强理论与实际、业务与政治的结合。^③ 吴玉章认为，在办学过程中，一定要防止一种“单纯业务观点”，反对“业务技术”的决定论。^④ 即青年们不能只准备当个一技之长的专家，而不过问政治的事情和进行自我思想修养。因此，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成为一切观念领导的前提与基础。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保证将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无疑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教育目的论

在吴玉章的教育思想逻辑中，教育的“人民性”指向教育目的论。这既包括吴玉章对教育活动中质的规定性的认识，即“为谁培养人”“为谁（哪个社会、哪个阶级）服务”；也包括吴玉章对教育对象的质的规定性的认识，即教育对象培养的社会倾向性与教育对象应有素质的认识。

在吴玉章的教育目的论中，他认为，旧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脱离人民、脱离大众，只是“教人一些空空洞洞的思想……多年来是和大众没有关系的，因此中国也才成了没有力量的国家，作了世界各强国的半殖民地”^⑤。为此，在新中国的新学校中，教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毛泽东提及的“作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勤务员”^⑥，时时刻刻普及教育，既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宇宙观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又要“训练广大的人民大众，要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水平”，还要让他们“掌握新生活新时代最进步的各种科学艺术，成为掌握机器化电气化的人才”。^⑦ 从我们党的教育实践来看，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教育方针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保证教育为广大人民服务。^⑧ 吴玉章教育思想的建构始终围绕人民大众而设计，只有人民大众尤其是劳动人民表现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性，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工农阶层表现出“自觉性、理智性、牺牲精神和坚定精神”^⑨，新中国的学校与教育活动才能体现出它的先进性和活力。同时，也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才能为高深知识的探索提供充分的知识和人力的储备，才能有效推进学术与学问，进而实现知识与技术的转化；而这也才是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根本追随。

（三）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实践与改革论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吴玉章教育实践与改革的根本抓手，这既能从其学习、革命、办学经历的实践中得以体现，又能从其“教育救国”到“教育建国”的思想转变中得以体现。一方面，教育问题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教育必然要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为社会改革与进步服务。这要求新中国的新教育、新学校必须扎根中国国情，去培养理解中国问题、懂得中国实践的现代青年，将科学研究“和中国人民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⑩。要求新中国的教育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要求新中国的新青年不虚伪、不轻浮、不好高

^① 《吴玉章教育文集》，23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

^{②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上）》，411页，重庆出版社，1987。

^{③④⑦}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296—297、311、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⑤⑥} 《吴玉章教育文集》，60、7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

^⑧ 参见《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21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⑩ 《吴玉章论教育》，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骛远、不粗枝大叶，让他们在中国大地上“从下层最小的事情上一点一滴的认真的做，切实的做，这样才能经得起考验，才能为群众办好事”^①。另一方面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并非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恰恰相反的是，吴玉章认为，“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不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要“活泼地运用马列主义”^②，要有世界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视野，能够在国际世界的整体联系中把握世界与本民族的脉搏，做到“和而不同”。

吴玉章的一生是中国优秀教育家的生动缩影，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社会现实，为党、为国、为人民兢兢业业坚持办学、坚持培养人才的奋斗人生。在吴玉章为国办学、为民兴校的坚持求索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滚滚时代洪流裹挟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困顿挣扎，也能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自主道路的坚持与决心。吴玉章教育思想深刻诠释了教育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更让我们坚定信念：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只有扎根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才能获得持久的、有生命力的发展。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党对于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毫无疑问，这便是吴玉章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与当代启示。

From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to “Build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A Study of Wu Yuzha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CHEN Luxi¹, WU Qiuxiang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Wu Yuzha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was inseparable from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 which underwent a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work-study doctrine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to the Marxist approach of “Build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He clarified th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of “developing education for the nation” and “running schools for the people”, emphasized the social, productive, and hierarchical nature of educ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d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popularizing education and educating new youths in the new era. Wu Yuzha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vividly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nation, and between academia and politics. It is an important revelation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education, including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s, to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that is always for the people, and to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form with the principles of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seeking the truth from facts, and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Key words: Wu Yuzhang; Educational thought;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Build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杜心蕾 责任校对 杜心蕾 林间)

① 王学军、周石主编：《吴玉章全集》第3卷，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② 《吴玉章教育文集》，7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